

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 对韩关系比较研究

石源华

以三一反日起义为起点的韩国独立运动和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序幕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同步进行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韩国革命曾被并列为 20 世纪初远东的三大革命运动。

数百万在华韩国侨民进行的反日复国斗争，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 年 4 月建立于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坚持斗争近 27 年，是韩国独立运动的旗帜和领导中心。本文即以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与此种独立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在 20 世纪上半叶，影响中国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一般常论的地理国防的唇齿相依、历史缘源的深远长久、文化思想的同宗同源以及近代共同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命运外，还有 3 点值得注意：其一，国际背景的重大变化。在此期间发生了 4 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重新划分远东势力范围，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形成，美苏冷战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影响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各政党、政治集团的对韩政策以及中韩关系的发展。

其二，中日关系的起伏跌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

后,日本加剧侵华,导致中日冲突频起,战争不断。两国为调整互相关系曾进行过无数次的谈判,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全面战争。在华韩国侨民的反日运动常常成为中日冲突与交涉的焦点问题。中国各政党、政治集团的对韩政策也无一不受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其三,中国政局的激烈变动。中国社会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其间又出现过北洋时期的南北政权对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共两党对峙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各种政党、政治集团交叉统治的复杂局面。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地域执政的中国政党、政治集团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又面临着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外交难题,因此,他们的对韩政策不仅互相间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同一政党、政治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完全相同,由此也决定中韩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以北洋集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护法派、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4 个政党、政治集团为对象,考察其对韩政策的沿革和实施,探究其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希望能有助于推进韩国独立运动史和中韩关系史的研究。

—

当 1919 年三一革命风暴席卷朝鲜半岛时,执掌北京中央政府权柄的是北洋集团。袁世凯逝世后,这个集团已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不断进行混战,分别或联合控制中央政府。三大派都热衷于对内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日本或其他列强的支持,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在外交方

针上 他们虽然对日本趁一次大战之机 强占山东权益 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在东北乃至全国各地扩张侵略势力表示不满,也希望利用战后有利的国际条件和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 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机会争回若干权利 并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区别 但都不敢对日执行强硬政策 只是企图通过联络欧美列强 逼使日本收敛其侵略势力。在外交策略上 他们也以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作为对日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不愿为支持韩国独立而刺激日本,影响自身外交目标的实现。另外,从稳定自身统治秩序和中韩交界地区安全出发,北洋集团、尤其是直接承受日本军事压力的奉系军阀也决不允许韩国独立党人在自己辖区内自由活动。当韩国独立党人的反日斗争引起中日严重交涉时,甚至与日本军方联合镇压旅华韩民的反日斗争。

三一革命爆发后 韩国人民立即把求援目标转向中国。中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很快收到韩人投递的《朝鲜国人民会报》要求中国支持韩人收回“已失之主权”挽救“既亡之民族”^①。3月4日,著名韩国志士安重根之弟重又根投书中国报刊,要求中国“遥呼远击作我后盾”^②。中国各报刊大量刊载“三一”运动消息,“表极端之同情于朝鲜独立”呼吁国人“或著论鼓吹 或奔走呼号 或陈请于国际联盟会议 或力陈于各国驻华公使 务使世人公认朝鲜之独立 且力促其实行 以除远东祸乱之源 植世界和平之基础 促人类平等之实现”等。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 援助韩国独立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并支持韩国独立。然而 北京政府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没有对韩国争取独立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5月底,韩国临时政府派赴巴黎代表金奎植向记者发表谈话 对此评价说:“中国代表其满怀同情 自不待言 但其自身回

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又时恐日人之鬼崇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④

如果说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对韩国独立运动采取的沉默态度尚能为韩国志士谅解，那么它对待活跃在中韩边境的韩族移民的反日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引起韩国志士的不满和反对了。三一革命后，长期在中、韩、俄边境活动的韩国独立党人顿时活跃起来，不仅在中国境内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各种机关，给东北境内的日军以重创，而且屡向韩国境内进袭，猛烈冲击着日本对于朝鲜的殖民统治。这种斗争至 1920 年珲春事件发生前后达到了高潮。吉林督军迭电北京政府请示应付办法，他在呈文中称：“三韩之亡族为大势所趋，揭竿继起，挺刃走险，奔走呼号，众势汹汹，其事虽碍我邦交，其志诚不可夺。”但“在吾国领土倡言独立，携带武器自由行动，既为公法所不许，尤为国际所难容。”主张对待韩国独立运动“形式上宜取严格主义而杜日人刁难要挟之口实”；实际上宜取严宽并济主义”；如遇大股武装韩党，仍以公法主权利害之词详细告诫，但使该党能以甘心折服，缴械自散”；倘仍坚持不服，或公然反抗”；即以武力解决。^⑤这一主张大体为奉系地方当局及北洋集团最高层所接受。

北京政府以及东北地方当局再三下令：“随时注意入境韩人是否有秘密集会、企图暴动情形，倘有形迹可疑，或已发见确实者，应即迫令解散，使其出境，如有反抗者，则以和平之手段，施充分之排解，务使暴动不发生于境内。”^⑥珲春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迅速颁布《大总统令》，责成该省军政长官迅即督饬地方军警驰往切实剿办。^⑦在随即进行的中日交涉中，北京政府更以出动重兵驱逐并镇压韩国独立党人为代价，换取日本从延吉地区撤兵。在日本方面的重压下，甚至出现了中国官方与日本军警

联合镇压韩国独立运动的可悲局面。1920年11月8日天津《大公报》首先披露吉林督军鲍贵卿与日本人町野（张作霖顾问）订定《中日会剿协定》8款，划定延、珲、和、汪、东5县为会剿军事区域。北京政府虽然矢口予以否认，但韩国独立军各部却在日奉联合镇压下，已无法在东北立足，于次年2月退入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南部休整。1925年6月11日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官松又逼迫奉天警务长签署《取缔韩人办法大纲》亦称“三矢协定”^⑧。1927年9月19日更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与奉天省长莫德惠正式签署《取缔东三省韩人协定》规定旅华韩人依中国官厅清乡章程编牌互保实行连坐，严禁韩人携带武器侵入朝鲜，犯者捕交朝鲜官宪办理，解散韩党，搜缴韩人枪械，逮捕、引渡朝鲜官厅指名之韩党首领，两国警察不得擅自越国境等^⑨。北洋集团奉行的对韩政策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结果却使韩国独立运动大受伤害，并为日本侵略者挑拨中韩关系开了方便之门。

鉴于北洋集团的对韩态度，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韩国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发生联系的史料。唯一见到的是1923年7月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公开信，就顾氏对报界谈话中有“高丽无国家资格”一语提出批评和抗议。内称：“国不国，在我，认不认，在人”；“敝政府在强权之世，法认则曾无，而实认则有之”；要求顾氏“务实去华；抑强扶义”^⑩。态度是严正的，语调却是温和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

与北洋集团对峙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却采取各种方式，力所

能及地支持韩国独立运动。析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虽然派系林立，思想混杂，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则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兴灭国，继绝世”的抑强扶弱的中华固有传统思想，视援助朝鲜复国为当然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主张三民主义，鼓吹民族主义，以解放包括朝鲜在内的远东弱小民族为其奋斗目标之一。孙中山曾指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依，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⑩其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韩国独立与中国安危以及远东和平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孙中山指出：“所谓二十一条及东三省问题、以及山东问题之重要性，远不及《马关条约》。盖日本侵略弱小，破坏东亚和平，案自订立《马关条约》始”，他们把韩国比作“东方的巴尔干”，认为“韩国问题如不早日解决，则亚洲局势将失去平衡，亚洲和平亦无法可以维持”^⑪。其三，南方护法军政府在外交上始终未为列强承认，在地域上又远离中日关系敏感地区，不像北洋集团直接面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压力，处理涉外问题有较大的自由度；其四，在华领导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申圭植、朴纯等早年参加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等为挚友，并曾倾其全部财产援助过中国革命，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战斗友谊，成为孙中山等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因素。

1919年4月5日，广东国民议会康基镐等331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从世界条约、条约义务、人类生存、中韩关系4个方面论证中国应该承认韩国独立，并指出：“若韩国问题为巴黎之举论者，中国庶几有望矣，不然则中国之危殆不远矣，东洋之将来，尤极暗澹”等，要求在巴黎和会上支持韩国独立要求^⑫。孙中山本人则如同他曾劝告日本对华取消“二十一条”一样，也发表谈

话 劝告日本承认韩国独立。他指出：“日本须容韩人之要求 而承认其独立为宜也 以韩日合并而买韩人之怨恨勿论 而中国人及其他人对日本之疑惑甚高 使日本陷于现在之苦境 与其莫大之影响矣 ”如若日本承认韩国独立 韩人自会“因此而表满腔之谢意 永久不忘 ”中国人对于日本也会“一扫其一切疑惑与不安之念 ”,昔日之交情复活 东洋之平和于兹确立矣¹⁴。这段谈话表达了孙中山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 他希望日本放弃对中国、朝鲜等侵略 实现东亚的和平与安定 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态度,鼓舞了在上海艰苦奋斗的韩国临时政府领袖们。他们把求援目标指向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在近代中韩关系上留下了一系列闪光的记载。1920年6月,当韩国临时政府获悉美国国会议员团将来远东考察之时,他们除积极准备直接向该团活动外 由法务总长申圭植致书孙中山 请对该团代言韩国真象。内称 先生于迎接之际,“对于中国及吾韩诸种问题 必有极精确之言论”,使该议员团返美时 转以宣言美之国民 俾得实力援助也 ”为此函请孙中山“于演讲或谈话时借重一言 想先生为正义人道 即无吾人之申请,亦必有所述及也 ”¹⁵。字里行间洋溢着亲切而又信任的情感。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酝酿、筹备期间 韩国临时政府又接二连三地派遣代表南下寻求支持。4月20日 该政府派遣吕运弘 携带大统领李承晚致孙中山的密函 前往广州 请求南方政府实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¹⁶。5月 著有《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史学名著的韩国政治家、史学家朴殷植应陈炯明之邀 前往广东活动 谋求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¹⁷。

这一求援活动的高潮是10月至11月 韩国临时政府代总

理兼外务、法务总长申圭植对于广东的访问。临行之前，申圭植发表了《敬告中华民国各界诸君子书》，从人道主义、世界和平、国际信义、中韩关系诸方面论述中国对于援助韩国独立“当引为己任而不容旁贷”指出援韩的“应时要著”是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提出“敝国独立议案，以求世界之公判”。^⑮11月3日申圭植作为韩国临时政府专使在广州拜会孙中山，提交了由该政府拟就的中韩互惠条款5项：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军政府为大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2. 请大中华民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3. 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于大中华民国军校；4. 请借款500万元；5. 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孙中山虽因“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仅以广东一省力量”，难以满足韩方全部要求，但仍明确表示对于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并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各军校尽力吸收韩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帮助培养韩国军事人才，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⑯11月18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暨正式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仪式。申圭植向孙中山呈递了国书，并互致贺词，双方由此而正式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

申圭植此行途中还在香港会见了中国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唐继尧。申氏向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就结识的老友唐继尧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成立经过及奋斗情形。唐氏表示：“今后如再回滇，誓必为韩国养成军官人才，至少2师团，俾协助贵国革命”并答应将尽可能在经济方面赞助10万元。双方约定由韩方派遣朴纯驻滇，接洽中国军校招收韩籍学生事宜。^⑰

虽然由于1922年6月发生陈炯明叛变，广东政局发生骤变，孙中山承诺之事未能付之实施。但孙中山所确定的支持韩国

独立运动的原则却为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南方各军校包括唐继尧所办云南陆军学堂及日后国民党所创办的黄埔军校等都曾收纳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为韩国独立复国运动培养了相当一批军事人才。

三

中国共产党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由党的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这个理论指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而且也以此看待韩国独立运动。因此 该党不是一般地支持韩国的独立复国，更不希望朝鲜李氏王朝重现 而是支持韩民族实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 使韩国在完成民族独立的同时 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其政治信仰、组织路线及其在野或在地下活动的地位 使其与韩国独立运动在联络对象、援助方式等方面都与执政的其他政党、政治集团有着很大的区别。

当三一革命席卷朝鲜半岛之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诞生，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已以满腔热情关注着这一场民族革命风暴的兴起。3月16日 由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率先以《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为题 报导评述韩国三一革命。3月23日 又以《生气和杀气相冲 公理和强权苦战 且看最后那一天到底谁胜谁败》的醒目标题 再次作了详述 并发表署名只眼的短评《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情》 称颂该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 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¹⁹²¹年1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工人

运动领袖的施洋和韩国志士李基彰等在汉口创办中韩国民互助社^{②1}。3月，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在长沙参与组建中韩国民互助社，并和何叔衡、贺民范分任该社通讯、宣传、经济3部主任。^{②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予韩国独立运动以更多的关注，既有热情的肯定和鼓励，也有中肯的批评和劝告。1922年7月，中共中央在“二大”宣言中高度评价韩国独立运动，内称：“高丽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表示中韩两国的反帝运动应当联合，“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迅速地打倒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②3}然而，中共中央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等借助列强谋取独立的观念和做法，则持批评态度。192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力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像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②4}这个批评是切中韩国独立运动之所以不能获得长足发展的要害的。

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中信奉共产主义的一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活动的著名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杨贤江等与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交往甚密。1922年1月，中共代表与韩国临时政府代表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相约互相支持，共同合作。在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加入黄埔军校以及叶挺独立

团的韩籍青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一起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在国共分裂后，仍有大批韩国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同生死，共命运。1927年12月11日，中共领导举行广州起义，韩国志士150余人，与中国战友共举义旗，并肩作战，最后大部分在沙河之役中英勇牺牲。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韩国志士组成中共江苏省法南区韩人支部及中国革命互济会上海韩人分会等组织，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甚至在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中，也都留下了韩国革命者的足迹。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与韩国抗日武装密切合作，长期坚持反日斗争。1937年夏，朝鲜革命军各部先后编入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军，使这些部队中的韩籍士兵占有相当数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除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韩国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以及中苏边境坚持武装反日斗争外，中国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还表现出3方面的新特点。首先，中国共产党改以往单纯与韩国共产主义者联络为广泛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各派接触，支持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1938年10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直接帮助、指导了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的创建。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等积极促成了参政会关于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数次提案的提出和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广泛参与了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重庆举办的各种活动。周恩来还担任了中韩文化协会的名誉理事。对于韩国临时政府，中共也与之建立了联系，并给予相当的尊重。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30余人同被推举为大会

名誉主席团成员^{②5}。在延安的韩国革命团体及抗日武装驻地都并列悬挂金九和毛泽东的画像。1944年6月为祝贺各党联合组成的韩国临时政府新部长就职，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曾设宴招待该政府国务委员和各部部长^{②6}。1945年11月初当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行将归国之际，周恩来、董必武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名义设宴欢送金九、金若山、洪震以及各部部长到会，宾主频频举杯，殷殷话别^{②7}。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的团结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表示出极大的关心。1942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韩文化协会举行的茶会上，颂扬韩国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流过血在中国的大地上”，语重心长地指出“韩国同志们为中国流血，但在自己的问题上却不能合作，这是很惋惜的事”，呼吁韩国志士加强团结；“在不久的将来”，能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自由与独立”^{②8}。1943年3月1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也在《解放日报》发表《团结复国》的文章，指出朝鲜革命力量的“内部派别分歧，未能团结一致”，是一切朝鲜革命者所必须努力克服的”，呼吁“一切朝鲜革命者都应当以建立广泛的抗日复国的朝鲜民族统一战线为职责”，大家不分党派、宗教，团结一致，真正为朝鲜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办的《新华日报》均以大量篇幅报道韩国独立运动，不仅反映了中共中央对韩政策的变化，而且也为此研究韩国独立运动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第二，中国共产党将制订正确的对韩政策列为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1934年1月，中共即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凡因革命运动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

到完全胜利为止。”^{②③}但这一规定还比较抽象和原则。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明确把“建立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列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②④}。随后，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详尽规定了对待旅华韩侨及韩国独立运动的一系列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1941年11月3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3年3月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指示》、4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5月10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等。这些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是：1. 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战避难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3. 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4. 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5. 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②⑤}。这些措施“大大提高朝鲜侨民之抗日认识，并鼓舞其参加革命的勇气，产生更大的抗日力量”^{②⑥}。大批韩国志士直接参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产生了很多杰出的人物。韩籍音乐家郑律成就是其中一个。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等大量抗战歌曲，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改名为《解放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沿用至今。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策在国统区全面得到推行，必能动员更加广大的韩国侨民参加中国抗战，韩国独立运动也必定会出现更加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三 中国共产党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侵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朝鲜义勇队及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部分成员辗转来到华北敌后参加抗战。194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和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成为中共领导和八路军指挥下的朝鲜抗日团体和武装力量。同年 月 该联合会曾参与发起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 年 月 该联合会改组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亦改名为朝鲜义勇军，并颁发宣言，宣布“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为目的。” 随后，该同盟在晋西北、晋察冀、冀西、太岳、太行、晋东南、冀鲁豫、淮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建立了分会，并建立了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及其在各根据地的分校，团结和集结了大批韩国志士，进行反日复国运动。朝鲜义勇军及其所属部队也在八路军的指挥下，参加了百团大战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战斗。 年 月 日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评价韩国革命者为中国抗战“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年 月 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6号命令，命令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 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②④}。这支英勇的部队为中国东北的解放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四

自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长期执掌中央政权 其对韩政策也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 国民党当局面临的对日外交局势与北洋集团类似 甚至更加险恶。日本当局采取种种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手段，逼迫国民政府取缔在华韩国独立运动 但国民党当局却未蹈北洋集团覆辙 而是根据内外情势变化 采取灵活的方针 明里或暗里支持韩国独立运动 其二 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党纲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 自然也在法理上继承了孙中山关于扶助弱小民族的政策，其党内不乏真心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有识之士 但在该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人还有着做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的念头 在对韩工作上夹杂着某些‘自大主义’情绪 这对中韩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微妙的影响。其三 中国国民党的对韩政策也与中国共产党不同 他基本上执行联系、笼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上层人物的做法 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把该运动纳入其统治秩序之内 不准越雷池一步 它未能像中共那样从动员下层群众入手 制订出一套广泛动员韩族群众参加抗日复国斗争的政策 唯恐那样会使该运动失控而影响其统治秩序。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自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直至七七事变 日本的侵略魔爪自东北而伸向华北而全中国 对日形势日趋全面险恶，韩国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导致国民党对韩政策不断发生变化，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为第一阶段。随着济南惨案后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南京当局在国民党内战中不断取

胜，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对南京国民政府抱有越来越大的期望。1929年3月，韩国独立党致电中国国民党“三大”，称颂国民党“积年奋斗，成功统一中国，谋民众幸福，保人类进化”，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伟大功勋”，吁请国民党对韩国革命“特加声援”。^⑤然而，南京国民党当局却忙于内争，执行对日妥协方针，未能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建立正式的联系，而只是采取某些非正式的方式，从道义上对韩国独立复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929年底，1930年初，韩国发生光州学生运动，韩国革命再起高潮。国民党中央虽未公开表明立场，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2月12日）、山西省党部（2月16日）、南昌市党部（2月24日）、汉口市党务整理委员会（2月）、青岛市指导委员会（2月）、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3月14日）等地方党部却纷纷发表通电、文告等，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道之残毒行为，并将韩国光州惨案与中国汉口水杏林惨案、济南惨案等作了比较，说明中韩都是被压迫者，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敌人；号召国人“救人适以自救”，应“激于义愤，发乎同情，应声而起，予以救援，俾其独立自主之大业早日完成。”^⑥

东北地方当局易帜后，在日本压力下，继续执行北洋时期的对韩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大量向中国东北迁移韩侨，有意挑拨中韩人民关系，东北地方当局却未能制订出妥善的对韩政策，致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万宝山事件及随后发生的朝鲜排华事件都因韩侨问题而起。1931年7月，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等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东省韩侨有7种相反相克的观念与感情：根据国民党原则，当令国内少数民族得其一律平等，但对韩侨却予歧视；对韩国独立运动在原则上表示同情与协助，但实际上却予严厉防止；在理论上，固认日人为国家之仇，韩人为革命之友，但实际上在东省却是颠倒之；在数字上，固知日人在东省

之投资与携械万千倍于韩侨，但在事实上却先着手驱逐无资无械之韩人，在道义上固表同情于流离失所之邻民，不能不使之安居乐业，但在感情上却视之为日人之走狗而唾骂；在数量上，固知韩侨中为虎作伥者少，为国尽忠者多，但在政策上却使之连带负责而混同之；在历史上，固知韩侨认东省为生聚尝胆之所，但在外交上却又抽薪而止沸等，批评国民党东北地方当局在对韩政策上的矛盾与混乱^{③7}。随即，赵素昂致函东北政务委员会，恳请发令东省各县“切实保护韩农”，并提出《东省韩侨善后案》，分政治、经济、教育三大部分，“希望贵会审查，俾见发令次第施行”^{③8}，要求全面调整中韩关系。

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发生为第二阶段。中国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侵占东三省，中国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为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在东北，长期坚持反日斗争的韩国各派抗日武装重振军威，与中国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在上海，韩侨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散发传单，举行集会，并组织慰劳队，支持中国抗战。1932年1月，旅居中国的韩侨4,597,281人发表《致中国人民书》，慷慨悲歌，表示愿“以贵邦之实力为后盾，以敝邦之死士为前驱，我军攻之关外，贵军守之关内，又敝邦在国之族将揭竿斩钉而起，气吞仇虏，血染山河，内外夹击为持久计。二千万死其半，犹可为国，四万万减三分之一，亦足为至大之国”等^{③9}。由此，韩国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日战略中占居的地位迅速上升。尤其在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发生尹奉吉掷弹事件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直接关注韩国独立运动，采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支持旅华韩侨的反日复国斗争。

1933年初，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曾在南京会见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④0}。在组织体系上，国民党主要通过